
濒危语言研究

在语言学中的地位

戴庆厦

摘 要：本文认为，濒危语言研究是语言学研究的新领域、新课题，有其独自的内容和方法。随着濒危语言研究的深入，语言学家将会更加关注濒危语言的研究，也将随之建立起适合于濒危语言研究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，使之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——濒危语言学。

关键词：濒危语言 语言功能 濒危语言学

近 20 年来，随着世界上濒危语言的逐渐增多，人们开始重视濒危语言研究。濒危语言研究已成为新的热门话题，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已成为语言学家的共识。在应用上，濒危语言研究在保护语言资源和文化资源、制定语言对策以及协调语言关系等方面的作用是容易理解和认识的。但在理论上，它究竟有何价值，特别是对语言学学科的建设有何重要意义，这是目前尚未认清并未深入研究的问题。本文主要以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的经验和体会，探讨濒危语言研究在语言学研究中所处的地位，并预测濒危语言研究将成为语言学中的一个新分支学科。

一、语言学研究的新领域

纵观语言学史，语言学研究主要经历了传统语法、历史语言学、结构语言学等几个阶段。历史语言学重在研究语言演变的规律，并通过语言比较构拟原始母语；结构语言学则注重语言内部结构的分析原则，使用一整套方法揭示语言的结构特点；而后来出现的转换生成学派一反过去不重视外在的言语行为，而主要研究人的大脑的语言能力。这些不同的学派，主要是探索语言内部的构造及其演变、生成的规律，其共同的目标是探讨语言究竟是一个什么现象，包括它是怎么起源的，怎么分化的，怎么融合的。这也就是说，以往的语言研究是研究语言的产生和发展，研究的对象一般是正在使用并不断丰富、发展的语言，即常规发展的语言。

但濒危语言研究则不同，它研究的对象是正处于衰亡的语言，或濒临死亡的语言。其研究的内容是揭示濒危语言的特点，包括使用功能和本体结构的特点。具体说来，它研究濒危语言的语言活力，确定某个濒危语言的活力处于什么状态；是什么因素使得这个语言

走向消亡,其中主要因素是什么,次要因素是什么;濒危语言在语言结构上呈现出什么状态;对待濒危语言的语言态度等等。

以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,也研究语言使用情况,研究语言活力,但并不研究语言功能的衰退、语言的消亡。结构语言学研究语言,面向的是正常运行的语言内部结构,并不关注濒危状态下的语言特征。濒危语言研究,不同于传统的语言结构分析,也不同于传统的语言分化、语言融合的研究。

语言学史的发展过程告诉我们,任何一个新学派、新理论、新方法的出现,或与语言学家对语言本质特点认识的变化有关,或与社会现实对语言需求的变化有关。比如,20世纪兴起的结构语言学,是语言学家、人类学家在实地调查、研究没有文字记录的印地安语的基础上形成的。这是因为印地安语的特点与印欧语不同,已有的理论、方法已不适用,促使语言学家去探索新的路子。语言研究中出现了濒危语言研究的新内容,是由于世界语言的演变大面积出现了语言濒危的新现象,使得人们必须关心濒危语言研究。人们看到,如何对待濒危语言,不仅涉及语言的保存问题,还关系到文化生态的保存,因为语言是文化的重要内容,还是部分文化的表现形式。所以濒危语言问题一出现,立刻引起语言学家、民族学家以及其他社会人文学家的关注。语言学家关注濒危语言研究,是语言学家关心语言现实的表现。濒危语言研究,必将为语言学研究增添新内容,推动语言学的新发展。

二、语言功能研究的新课题

语言功能,是指语言在社会中所担负的任务和职能。具体语言的功能,是受语言使用人口的多少,政治经济、文化教育的发展状况,以及历史背景、民族关系的特点等条件制约的。语言濒危,其实质是语言功能的严重衰退,因而研究濒危语言,就离不开对语言功能的研究。通过这些年濒危语言功能的研究,我感到必须建立、区分以下几个相关的概念。

(一)“强势语言”和“弱势语言”

存在于同一社会的不同语言,由于各种内外原因(包括语言内部的或语言外部的,历史的或现时的),其功能是不一致的。有的语言,功能强些;有的语言,功能弱些。强弱的不同,使得语言在使用中自然分为“强势语言”和“弱势语言”两类。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。多语社会的不同语言,语言竞争通常出现在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之间,其关系错综复杂,既有统一的一面,又有矛盾的一面。由于语言功能的大小不同,加上不同语言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,因而“强势语言”和“弱势语言”的语言竞争存在不同的走向,有着不同的结果。语言是社会的交际工具,必须适应社会的需要而改变自己。能适应的,就能存在,就能发展;不太适应的,就会发生变化;很不适应的,就会出现功能衰退,甚至走向濒危。濒危语言是“强势语言”和“弱势语言”在语言竞争中产生的结果之一。

语言竞争主要有以下几种走向:一种是互相竞争的语言长期共存,功能上各尽其职,结构上相互补充,在竞争中各自稳定使用。虽然进入竞争的语言有强弱差异,但弱者有其使用的范围,不可替代,不致在竞争中失去地位。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关系大多属于这一类。一种是:弱势语言在与强势语言的较量中,功能大幅度下降,走向衰退。其表现是:功能衰退的语言,只在某些范围内(如家庭内部、亲友之间、小集市上等)使用;

部分地区出现语言转用。我国的毛南语就属于这一类型。还有一种走向是：弱势语言在竞争中走向濒危，在使用中完全被强势语言所代替。我国历史上分布在北方的一些语言，如西夏、鲜卑、契丹、女真、焉耆、龟兹等语言，在语言竞争中消亡了。我国目前还有一些语言，也正处于濒危状态，引起人们的重视。如赫哲语、土家语等。

研究濒危语言，必须科学地认识“强势语言”和“弱势语言”的关系，把濒危语言放在这一对关系中去考察。

（二）“濒危语言”和“衰变语言”

研究濒危语言，必须首先弄清什么是濒危语言。语言功能退化到一个什么程度才算是濒危语言？怎样确定濒危语言的标准？这些问题在语言学界目前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，成为濒危语言研究中的一个难题。如果不能科学地确定濒危语言的界线，任意扩大或缩小濒危语言的范围，把已濒危的语言和尚未濒危的语言放在一起谈，就会造成认识上的混乱，无论在理论上、解决实际问题都是不利的。当然，这是一个有相当难度的问题，需要经过一番艰苦的探讨才能解决。

在《濒危语言研究中定性定位问题的初步思考》^①一文中，我与邓佑玲初步提出了“以量化的多项综合指标体系为依据来判定一种语言是否是濒危语言”的论点，认为造成语言濒危的因素不是单一的，而是多种多样的。濒危语言的形成，主要与使用人口、使用范围、使用功能等因素有关，而且还受历史变迁、民族关系、婚姻关系等因素的制约。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现象，如果没有一个量化的、可操作的指标，只依某一单项指标，则难以判断是不是濒危语言。多项综合指标体系指的是与语言功能相关的因素，包括语言的使用人口、使用功能、使用范围、使用频率等。这当中，使用人口、使用功能是最重要的。综合指标体系存在主次之分，所以还可分核心指标和参考指标两类。当然，这里提出的只是一个大的框架，在具体实施时还要进一步细化。

近期，我与张景霓又提出区分“濒危语言”和“衰变语言”的观点。因为在濒危语言研究中，有的把人口少作为判断濒危语言的唯一标准，甚至把使用人口在五万人以下的都列为濒危语言。诚然，使用人口少的语言容易出现濒危，但从我国民族语言的实际情况看，并非完全如此，因而不能笼统地以此划界。事实是，有的语言虽然使用人口少，但在某种特定条件下不一定出现濒危。我们在实地调查中，多次看到这方面的例子。比如分布在我国西南边疆的独龙族，人口只有 7426 人（2000 年），但由于主要聚居在云南独龙江一带，较好地保留自己的母语。又如，说波拉语的景颇族支系，虽只有 500 余人，部分人还与说别的语言的支系杂居在一起，但他们的母语波拉语却无一例外地在使用。有的民族虽然部分人因与别的民族杂居而出现语言转用，但其主体部分或一部分却仍然稳定地使用自己的母语，还有相当的生命力。这样的语言不能算作“濒危语言”，只能算做“衰变语言”。阿昌语、毛南语等就是属于这种情况。下面介绍一下我们近期经过实地调查而获得的毛南语情况。

毛南族是分布在我国广西的一个少数民族，总人口为 71968 人（2000 年）。主要聚居在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，共有 58893 人（2003），占毛南族总数的 77%。但毛南语使用人口只有 31000 人，约占毛南族总人口的 43%，57% 的人已转用壮语或汉语。因而毛南语是

^①戴庆厦、邓佑玲：《濒危语言研究中定性定位问题的初步思考》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》2001 年第 3 期。

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中使用人口较少的一种语言。保持母语的毛南族，还普遍兼用汉语，并有相当一部分人兼用壮语，是一个全民双语型和部分三语型的群体。从是否保持母语这一角度分析，毛南族的语言使用状况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：一种是母语保持型；一种是母语消失型。这两种不同的类型，是毛南语语言活力的不同层次，反映了毛南语语言功能下降的递进性和渐变性，同时也反映了毛南语使用功能的不同走向。

下南乡是毛南语稳定使用的一个地区。这个乡的人口有 20018 人（2003），居住着毛南、壮、汉等民族，其中毛南族占总人口的 98.2%，几乎是清一色的毛南族聚居地。毛南语是这个乡的通用语，毛南族无一例外地会说毛南语。我们于 2004 年 2 月和 2005 年 3 月两次到下南乡做实地考察，看到那里的毛南族家庭全都使用毛南语交际，一家男女老少都会说毛南语，特别是青少年几乎全都会说毛南语。在村寨中，居民的交谈用毛南语；集市贸易中使用的语言主要也是毛南语，间或杂以壮语或汉语；村里开会时也用毛南语，只是在传达文件时用汉语。乡里的干部正式开会时说汉语（桂柳话），但在会下交谈时仍用毛南语。毛南族有丰富多彩的、用毛南语创作的口头文学，如民间故事、历史传说和民歌等，他们通过口传心授，世代相传，发扬和保留了毛南族优秀的传统文化。在这个乡停留期间，我们真实地感受到毛南语旺盛的语言活力，以及毛南语稳定使用的状态，丝毫没有感到毛南语有濒危的迹象。当我们向村民问到毛南语是否会消失时，他们普遍回答“不会消失”，而且认为毛南语在很长时间内还会使用下去，甚至有的还很自豪地说“毛南语会永远保持下去”。

毛南语在下南乡得以保留，是由多方面条件决定的。其中既有社会、地理、历史、人文等条件，还有民族关系、语言观念等制约因素。这些构成了一个语言得以稳定保存使用的外部机制，使其不至于在语言接触和语言影响的冲击下，改变或丧失基本的使用功能。

区分濒危语言和衰变语言有其理论价值。它区分了语言功能衰退的类型，有助于划定濒危语言的界线和认识。而且在应用上，有利于“对号入座”，制定濒危语言的对策。

三、语言结构研究的新角度

语言走向濒危，必然在语言结构上有所反映，有不同于非濒危语言的特点。研究濒危语言，除了研究濒危语言的功能及其成因外，还要研究濒危语言结构的变化。濒危语言结构变化的研究，是语言本体研究的新角度，能使我们获得未知的语言特点，丰富对世界语言的认识。因为语言学家过去研究语言只研究正常使用的语言结构，而濒危语言结构研究则要挖掘因语言濒危而出现的新特点。

濒危语言的结构变化，有不同程度的“等级”，变化的方式也不相同。与非濒危语言相比，濒危语言的结构变化一般说来有以下几个特点：1、濒危语言受强势语言影响的程度较深。影响甚者，外来成分已进入核心领域，并部分地改变本语的基本特点。有的甚至出现与“强势语言”趋同的趋势。2、濒危语言受强势语言影响的面较宽，涉及语言结构的方方面面。不仅词汇、语音受到影响，相对稳固的语法也受到影响，甚至在语言表达特点上也受到影响。3、濒危语言结构的变化受语言使用者等社会语言学因素的制约较大，不同年

龄、性别、职业的人的言语变体相对明显。下面举仙仁土家语的一些例子^①。

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我国的湖南、湖北、四川诸省，人口 8028133 人（2000 年），目前会说土家语的土家族人还不到总人口的 3%，已处于濒危状态。仙仁土家语是湖南省保靖县仙仁乡土家人说的话，是保存较好的一种土家话。但仙仁土家语在长期与汉语接触的过程中，已受到汉语强烈的、大面积的影响。

词汇方面，在 2844 个词汇中，汉语借词已有 1404 个，占 53.1%。汉语借词包括大量最常用的基本词，如“月亮、沙子、气、胆、老人、朋友、父亲、母亲、弟弟、马、猫、芽秧、玉米、棉花、裤子、盖子、高、低、满、新、老、甜、沉、叠、骑”等。不仅有实词，还有不少虚词，如“很、真、还、也、再、可能、大概、不、比、的”等。数词用土家语只能数到“六”，“六”以上都使用汉语借词。有的概念，虽有土家语词，但不使用而使用汉语词。有不少概念是汉语词和土家语词并用的。还有不少复合词，构词词素是由汉语词素与土家词素构成的。

语音方面，仙仁土家语同样受到汉语的强烈影响，包括声韵调各方面。在声母上，阳平浊声字的汉语借词影响仙仁土家语出现声母浊化现象；汉语借词的影响使得仙仁土家语出现大量送气与不送气并存；汉语借词带进了一些鼻化元音等。

在语法方面，仙仁土家语受汉语的影响也有很大的变化。主要有：出现了“数+量+名”的新语序；吸收了汉语的 VO 语序，OV 与 VO 两种语序并存；借用了汉语的判断词“是”，构成判断句；吸收了大量的汉语虚词等。

总的看来，仙仁土家语接受汉语的影响已进入核心领域，在发展趋势上正在向汉语的特点趋同。

四、语言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——濒危语言学

濒危语言研究与以往的语言研究相比，既有共同点，又有不同点。但濒危语言研究是语言学研究的新领域、新课题，有其独自的内容和方法。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、信息化的深入发展，以及不同国家、不同民族、不同地区相互交往的不断加强，濒危语言的出现将会增多。语言学家面对语言变化的现实，将会更多地、更深入地研究濒危语言，并会逐渐建立起适合濒危语言研究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，使之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分支学科——濒危语言学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）

责任编辑：冯学锋

^①戴庆厦、田静：《濒危语言的语言活力——仙仁土家语个案研究之二》，《思想战线》2003 年第 5 期。戴庆厦主编：《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》，民族出版社 2004 年版。